

误解俄罗斯

《中国改革》-财新网 作者：许成钢

2010年09月01日 15:57

在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备受压抑的情景下，不谈制度的变革谈现代化，一定达不到现代化的目的

舒瓦洛夫足够坦诚，敢于并乐于向外国记者讨论俄国存在的问题。他看到俄国的具体问题所在，却是只见物质不见精神，只见技术不见制度，正好丢掉了俄国面对的核心问题——制度问题。在缺乏对制度问题起码认识的基础上，各种“中央计划式”的“宏伟规划”不仅缺少新意，且没有可能走远。

过去苏联的问题源于制度。苏联时代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持续30年的经济改革失败，原因在于不能从基本上改变极权统治下的计划经济制度。这一经历两代人的惨痛失败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思想、制度、物质基础。

如今俄国的问题仍然在于制度。苏联解体时的混乱以及当时政策制定者对苏联的制度问题理解之肤浅，使俄国经济从极权统治下的计划经济变成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再进一步演变成高度寡头垄断、极不平等、缺少秩序的非竞争的市场经济。

这种压制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制度打击创新，打击企业家精神。无论是市场活动的创新还是管理的创新，无论是概念的创新还是技术创新，生存空间都极其狭小。同时，高度寡头垄断的政治、极不平等的财富严重侵蚀年轻人的灵魂。年轻人对精神的追求被物质与权利欲望所取代。这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科学、技术、艺术人才济济的俄国，现在沦落为一个产油国、一个能源输出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水平都已与世界强国无缘。

在技术层面，俄国的经济几乎落后得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相似。不仅谈不上创新，除了武器，甚至连制造业都所剩无几。俄国在科学技术和经济上如此迅速的衰落完全超出了想象。如果不是地下的黑金蕴藏丰富，俄国的经济会沦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所谓“金砖四国”（BRIC）也只好改名为“圆珠笔三国”（BIC）（BIC为法国圆珠笔公司之名）。舒瓦洛夫将俄国由于制度带来的问题归为“旧产业”等，实为误诊。

谈到将莫斯科发展成为金融中心时，舒瓦洛夫论及莫斯科比纽约的优势，读来尚浅。国际金融中心靠的是对国际投资者和融资者的吸引力。产生持续吸引力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保证投资安全的制度，尤其是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金融中心均产生于当时司法制度最好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如今世界上所有国际金融中心所在也都是举世公认的司法制度最好的城市。缘几何时，仰仗新产生的欧元远远超越老旧英镑的实力，德国

曾试图将法兰克福建成超越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今变成完全被世人忘记的不可能。此议论当然也同样适用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努力。

长话短说，当舒瓦洛夫着力强调梅德韦杰夫总统关于现代化的纲领，尤其是俄国现代化的五个方向时，让我想起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这是“文革”后期由周恩来推动的纲领，是中国改革的起源。三十几年“文革”与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制度的改革，在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备受压抑的情景下，不谈制度的变革谈现代化，一定达不到现代化的目的。发明创造需要自由，企业家投资者需要信心，消费者需要保护，现代的经济、现代的技术需要通畅透明的信息。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改革阻碍进步的制度。这是我读舒瓦洛夫的基本感受，也是我对中国近年来改革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的担心。